

流动的家庭佣工^①

——历史的轨迹和当代的影响

[美] 克里斯蒂安娜·哈齐格 撰 林周婧 崔戈 译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摘要] 全球化对国家经济、国际劳动人口和消费体系的影响已被探讨很多,可是我们对一些私人领域,例如两性关系、家庭关系和个人生活轨迹等方面认识甚少。从移民家庭佣工身上可以知道全球化对家庭关系和家庭生活安排的影响。看到除了对其个人前景和两性关系有所改变外,还进而改变了社会及文化。

[关键词] 全球化; 移民; 佣工; 国际劳动人口

[中图分类号] K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2010]06-0012-09

全球化对国家经济、国际劳动人口和消费体系的影响已经被大量探讨过,可是对一些私人领域,例如两性关系、家庭关系和个人生活轨迹等方面却知之甚少。外籍家庭佣工填补了这一空白。很多妇女移民到外国做家庭佣工,这一行为表明了国际劳动人口和私人生活间的相互联系;她们的种种活动体现了全球化对家庭和家居生活安排的影响。外籍家庭佣工的出现除了对她们个人前景和两性关系有所改变外,还进而改变了社会及文化。她们的变化发展促成一个跨文化领域的形成,其中包含社会的变化发展。

有薪外籍女家庭佣工^①组成了外来劳动人口中一个最大的女性人群,不仅20世纪和21世纪是这样,实际上在移民历史上历来如此。经济结构重组(主要是农业和纺织业),财富的不平均分配和国际劳动人口划分上的变化都说明了这一点。世界各地由于各种各样的家庭佣工移民体系联系了起来,不过外籍家庭佣工的确切人数、变化趋势和历史发展几乎无法确切地知道。^②

这样的移民是否依然不被列入男性统治社会,或者是否被视为世界范围内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与分析的角度。对外来移民的主流研究中,对单身女性关注很少。但是如果把这种移民看成两性共同广泛参与的过程的话,那么外籍家庭佣工就是一支庞大的队伍。然而实际上无论世界范围内的还是相对地区内的都很难找到移民潮性别方面的数据。^③绝大部分外来佣工都没有得到政府的管理,对政府来说他们仿佛是“透明人”,所以通常外来佣工移民在暗中活动。简而言之,对此没有文件记录。

①收稿日期:2010-04-06

作者简介:克里斯蒂安娜·哈齐格(Dr. Christiane Harzig),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译者林周婧,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博士生;崔戈,大连理工大学外语学院教师。

①术语的解释:目前最常用的指代妇女的术语就是家庭佣工、家务工人,或在英国被称为有薪家庭女佣工,这最有可能是最准确的术语。历史上“家务佣人”确切含义指该职业的从业人员。本文谈到历史情况时使用“家务佣人”一词,谈到现今的情况使用“家庭佣工”一词,谈到这种体制时使用“家政服务”一词。

②Heyzer/W ee (1994)指出“很多官方的统计数字未能准确说明女佣这一行业的实际人数,尤其是那些非法移民过来的”,第39页。Heyzer, Noelen, Geertje Lycklama á Nijeholt and Nedra Weerakoon, eds. 1994. *The Trade in Domestic Workers: Causes, Mechanisms, and Consequences of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London: Zed Books.

③现有的统计数据经常前后不一致,或已经过时。有些国际研究机构和经济智囊团的调查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参见各种OECD报告,移民政策学会的数据,等等。

由于同样的原因, 社会研究也非常缓慢地开始了解那些移民的外来家庭佣工对社会的深远影响, 包括对她们所离开的国家, 也包括对她们所迁入的国家。在后者的社会(西方社会)里, 外籍佣工的出现已经引发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大量讨论。人们对再生产领域劳动(包括照顾老人儿童、干家务活、提供情感和教育上的帮助)的关注; 其他来源的人员加入外籍家庭佣工群体的过程和种族等级制度的固化; 女权主义要求和运动的一致性与多样性; 对再生产领域劳动和家务劳动价值和技能的肯定; 最后但不是不重要的一个就是移民政策, 这些话题都在讨论之列。虽然讨论开始于外来佣工的出现, 但现在讨论的内容已触及到社会的核心问题。

那些外籍家庭佣工的祖国有同样的问题。这些国家的许多妇女去别国干家务活, 因为她们认识到自己必须养家糊口, 也有能力这么做。家人也支持她们做出这样的决定, 这很常见。去国外干活来挣钱养家, 不仅可以提高妇女家中的地位, 还十分有助于增强她们的自信, 而且她们的工作经验和技能也提高了。这一切, 包括妇女担起家庭的责任, 都对两性角色、两性关系有一定影响。拿养育子女来说, 母亲长时间外出工作对孩子们的成长是不利的, 但是人们早就在争论从长远来看这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母亲外出去赚钱可以加大子女受教育的经济投入(Hatmachji 2003)。①使孩子能受更好的教育有更好的前途, 是这些女性外出务工最重要的精神动力之一。她们给家里的汇款对本国的经济状况有深远的影响, 因此政府设立了许多可以快速简单兑换货币的专门地点。这些款项可以帮助国家保持外币的收支平衡, 所以国家经济也依赖于此。到目前为止, 这些汇款主要用于消费, 对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的长远作用不大。政府出台了各种经济政策以纠正投资领域的不良现状。

本文将对过去和现在不同的外籍家庭佣工移民体系做出简介, 并提出她们的迁移对原住地社会和前去工作的社会有何影响。

移民体系

从地区性社会学研究、人类学研究和历史研究中可以得知移民制度的组成、发生、维系和组成成分(Lucassen/Lucassen 1997; Jackson/Moch 1996)。②当一种移民现象中包含了大量的社会成员又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时, 这种移民就形成了某种体系。出现移民体系既由社会结构决定, 又源于和维系于参与其中的人以及他们的活动。不同国家经济之间的依赖, 不平等的发展(如美国墨西哥之间, 德国波兰之间), 中心边缘辐射效应, 加上殖民主义、历史移民问题、文化相似性, 还有相邻的地理位置, 都使移民体系得以发展。然而移民体系要进一步扩大, 这些社会结构方面的因素还必须通过私人与私人的关系和一些推理得来的关系联结起来。认同与记忆是移民体系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那些在移民体系内迁徙的人维持着这种认同和记忆, 移民体系内部的整体社会环境也维持着它, 各种四处传播、不断招揽来新成员的信息同样维持着它。移民过程中成功的事例总比失败的事例流传得广。迁移出去的人与原住地的人常有联系, 国家的政策和机构也为移民大开方便之门。所有这些对于维持一个移民体系都相当重要。移民体系涉及的面很广, 比如它把南亚与波斯湾或北美联系在一起。它也可能涉及到十分具体的历史时期或地区, 比如 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女孩移民到荷兰;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波兰妇女移民到芝加哥; 斯洛文尼亚妇女移民到埃及(Henkes, Knothe, Barbič / Micklavšič - Brežigar)。

罗波塔·爱斯皮诺莎(Roberta Espinoza)在《世界妇女》(Ehrenreich/Hochschild 2002: 325)③中归纳过四大移民体系: 1. 南亚向波斯湾; 2. 南亚向欧洲; 3. 东欧、非洲向西欧; 4. 墨西哥向中北美洲。把这几个移民体系加以区别并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去考查, 就可以更好的了解移民是怎么成为体系的, 也可以更好的了解这其中女性移民的经历。经过这样的研究我们会进一步看到移民体系的错综复杂。

我们目前了解得最多的移民体系涉及到各个亚洲劳工输出国、劳工输入国和中东地区。尽管在北半球人们并不十分关注这个体系, 也不认为它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密切, 这一体系很可能包含的人口非常多, 涉及到的外籍佣工原住地国家有孟加拉、缅甸、印尼、中国、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 佣工所迁入的国家和地

①Hatmachji, Sri Haripti. 2003 "Gender Dimension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 Indonesian Case."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Ad Hoc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angkok. August 2003.

②Lucassen, Jan and Leo Lucassen, eds. 1997. *Migration, Migration History, History: Old Paradigms and New Perspectives*. Bielefeld: Bertelsmann. Jackson, James Jr. and Leslie P. Mod, 1996 "Migration and Social History in Modern Europe." In Hoerder/Mod, *European Migrants*, 52-69.

③Ehrenreich, Barbara and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eds. 2002. *Global Woman. Nannies, Maids, and Sex Workers in the New Econom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区有文莱、波斯湾、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新加坡和加拿大 (Heyzer/W ee 1994: 36)。^① 其中有的国家比如巴基斯坦, 既是佣工的原住地, 又是别国佣工迁来工作的地方 (N ijeholt 1994: 10)。^② 区分这两种社会的显著标志就是巨大的财富分化。据估计, 这个移民体系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有 100 万到 170 万的妇女成为外籍家庭佣工 (Heyzer/W ee 1994: 40)。

第二个移民体系中欧洲是外籍家庭佣工前去工作的地方。这些妇女可能来自英法以前的殖民地, 也可能是从中东欧国家去德国 (波兰) 和奥地利 (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意大利和希腊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阿尔巴尼亚妇女做家庭佣工的地方, 假如她们能安全度过亚得里亚海的话。^③ 早就有人研究过意大利和菲律宾也有密切联系 (Parreras 2001)。^④ 欧洲内部的南北移民潮从另一方面也使劳工市场供应充足。来务工的女性有的通过中介机构进入欧盟, 有的来寻求政治避难, 有的打旅行签证的主意, 常有些人被视为非法入境。

第三个移民体系中佣工移入地是北美洲, 移民的佣工来自菲律宾、拉美地区、加勒比海地区, 例如多米尼加、牙买加、萨尔瓦多、瓜地马拉, 不过最多的来自临近的墨西哥。^⑤

然而, 在拉丁美洲和讲西班牙语的美洲地区, 妇女外出务工与上述地区不同。该地区本身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移民体系, 富裕的地方吸引着很多劳工离开贫困地方来务工。像过去一样, 妇女从乡村和城市周边流向城市, 文化因素使这一迁移从未停止。上世纪 70-80 年代拉美大约 20% 的女性劳工做家庭佣工, (Mansen 1999: 81, Pappas-Deluca 1999: 100)。^⑥ 80 年代在波哥大, 家庭佣工占总人口的 17.4%, 其中 98.2% 是妇女。这个数字说明的只是住在主人家的佣工数量 (Castro 1989: 106)。^⑦ 在布依诺斯艾利斯这一百分比从 40 年代的 30.5% 下降到 80 年代的 20.6%。但实际数字从 40 年代的约 370 万 6 千增长到 80 年代的 567 万 (Gogna 1989: 84)。^⑧ 虽然有人做出与上面的发展趋势相反的预言。家政服务, 常以一种前现代的工作类型出现, 在拉丁美洲过去和现在从来也没有走过下坡路。

与南美洲的情况相同, 非洲的这一情况有其历史和文化背景。这种移民以家族关系为依托, 收养孩子, 从乡村出来投靠城里的亲戚, 一边给他们做家务一边学门手艺 (Sanjek, 1990), 所以非洲的家庭佣工主要来自内部移民, 即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 或者在文化同构的国家之间, 或者是从边远农村地区向中心城市流动。南部非洲的工作一直都和移民密切相关, 实际上由于空间的分隔和“种族”隔离, 流动导致就业, 就业导致流动。当矿工做临时的工作以及有意识地在村庄和矿山之间轮流工作时, 这种情况无论过去和现在也适用于他们, 家庭佣工亦是如此。20 世纪 90 年代末, 在南非从事家务劳动已经成为第五大正式工作 (LeRoux, 1999: 185)。^⑨ 因为交通不便而且每天的工作时间长, 女性劳动者不论是从乡村到城市的, 还是住在边远地区的, 都得住在雇主家里, 或者说这使得住在雇主家里成为最好的选择。

殖民历史也是促成非洲人向欧洲移民务工的原因之一。埃塞俄比亚人、厄立特里亚人、索马里人去意大利, 塞内加尔的妇女去法国, 尼日利亚和加纳的妇女去英国。加拿大的魁北克省也常有说法语的非裔移民。这些移民中有一些本来是难民或是来寻求政治避难的。可是他们中的许多妇女经常一边等待欧洲北美当局批准她们的难民身份, 一边去做家庭佣工赚钱。所以说难民与务工移民的区别并不十分明显。

奴仆制度的推理性构建

①加拿大之所以也包括在这一体系中是因为该国有大量的自菲律宾移民过来的妇女。Heyzer Noelen and Vivienne W ee 1994. "Domestic Workers in Transient Overseas Employment: Who Benefits, Who Profits." In Heyzer et al. *The Trade in Domestic Workers*, 31-102

②N ijeholt Geertje Lyk lan a ò. 1994.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and Domestic Workers: A Macro Overview." In Heyzer et al. *The Trade in Domestic Workers*, 3-30.

③阿尔巴尼亚到意大利的移民竞争激烈因此也很危险。定期地有各种可怕的消息在欧洲流传, 指责意大利保护边境方面的不足。

④Parreras Rhacel Salazar 2001. *Servants of Globalization: Women, Migration, and Domestic Work*.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⑤以上各种移民体系的图示可参见 Ehrenreich/Hochschild, 2002: 276-279

⑥Mansen Janet Henshall 1999. *Gender, Migration and Domestic Service*. London: Routledge Pappas-Deluca Katina 1999. "Transcending Gendered Boundaries: Migration for Domestic Labour in Chile." In Mansen, *Gender, Migration and Domestic Service*, 98-113.

⑦Castro Mary Garcia 1989. "What is Bought and sold in Domestic Service? The Case of Bogotà: A Critical Review." In Chaney/Castro *Muchachas No More*, 105-126.

⑧Gogna Mónica 1989. "Domestic Workers in Buenos Aires." In Chaney/Castro *Muchachas No More*, 83-104

⑨LeRoux Tessa 1999. "Home is Where the Children Are: A Qualitative Study of Migratory Domestic Workers in Mmotha village, South Africa." In Mansen, *Gender, Migration and Domestic Service*, 183-182.

移民体系不仅可以通过主体的结构变化来解释,这样的体系也有其历史范围。经济结构的重组过程,历史上奴仆制度背景以及女性的社会角色都支撑着移民体系。这些大环境的成形有历史原因,而各个不同的社会也有各自的具体情况。

美国、加拿大的家政服务主要体现了移民功能和排斥异己的心态。这两国都是白人定居的社会,在体制上极为相似。但是由于两国所走的历史道路毕竟不同,移民政策也不同,所以两国的家政服务也不相同。美国曾经实行过奴仆的师徒契约制、移民入境制、奴隶制、种族等级制、种族隔离制、非法移民入境制和绿卡政策,这些无不说明了家政服务方面存在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随历史的改变而改变。在加拿大,家政服务呈现下面这些特点:其人员有从法国来的已订婚的女士,有从英国来的单身女性。招募她们是为了教化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作为哺育这个新社会的母亲,她们确保国家未来掌握在白人手里;还有从西欧北欧招募来的妇女,通过“住家保姆”计划招募来的妇女。所谓“住家保姆”计划即政府出台一些政策吸引加勒比海地区和菲律宾的外籍移民,来为夫妻双方都工作的家庭照料家务,从而弥补政府在对本国幼儿提供照顾方面的不足。^①

在《西属美洲》(Spanish America)一书中,正如库斯尼索夫(Kusnesof)的历史记录(1989)指出的那样,家政服务既是殖民时代生活方式的产物,又是从乡村向城市移居的产物。社会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原来家庭由男性统治的,是权利集中的基本单位,妇女只能在男人的保护下生活,或者说只能接受男人的领导。殖民时代这种观念开始逐渐演变,一直到20世纪,社会的观念形态甚至强调妇女有能力出去工作,而家政服务在这时成了贫穷单身妇女最理想的工作。她们在雇主家里工作,从男主人那里可以得到足够的保护,从雇主的家庭生活中可以学习知识可以为自己未来的婚姻做准备。16世纪到19世纪的殖民时代,除了低技术含量的生产和城市里的各种服务行业以外,家庭生产^②是生产的主要地点。有大批佣人受雇于此行业。在大都市里(布依诺斯艾利斯、墨西哥城、加拉加斯)20%的家庭雇用家务佣人,一个到几个不等(Kusnesof 1989: 22)。^③

外籍家务佣人的大量出现,或许就是因为她们的大量出现,家政服务领域内出现其他人员进入这一行业的过程和家長统治有所改变的现象。17世纪西班牙移民过来的妇女以订立契约的仆人身份出现时,勤劳的妇女也被雇佣,处于一种半奴隶状态下工作;后来黑人和解放了的奴隶也进入雇主家庭干起了这一行;许多人还源源不断地从乡村涌向城市。当劳动阶级的妇女和其他来源的妇女开始占据这一行业时,原来在亲属关系基础上的雇主对家庭佣人的家長统治随着时间而改变了。此时,家政服务工作和“处于阶级/种姓/肤色制度的底层的人”联系起来,在西班牙裔美国人的社会中占了主流,并且引起主仆关系的逐步疏离和这一工作作为服务性职业的地位的丧失(Kusnesof 1989: 22)^④。

到了20世纪,由于科技的发展和城市各项服务的改进,再加上男人工作机会和工资待遇的改善,家政服务似乎萎缩了下去。可是,随着二战后白人妇女工作机会的增多,对家庭佣人的需求又增长起来。与此同时,农业发展前景不看好,很多妇女不断地来到城市找工作。这里不太需要不熟练的女产业工人,所以家政服务依然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选择^⑤。

和其他地方一样,拉丁美洲家庭佣人的流动有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在里面。一方面农业经济结构

^①关于这两国家家政服务方面的文献很多。例如关于美国的,参见Katman, David M. 1978 *Seven Days a Week: Women and Domestic Service in Industrializing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amero Mary. 1992 *Mail in the U.S.A.* New York: Routledge. Glenn Evelyn Nakano. 1994 "From Servitude to Service Work: Historical Continuities in the Racial Division of Paid Reproductive Labour" In Vicki L. Ruiz and Ellen Carol Dubois eds. *Unequal Sisters: A Multi-cultural Reader in U.S. Women's History*,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Pp. ????. 关于法国的,参见Barber, Marilyn. 1991. *Immigrant Domestic Servants in Canada. Canada's Ethnic Groups*. Ottawa: Canadi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Daenzer, Patricia Margot. 1993 *Regulating Class Privilege: Immigrant Servants in Canada, 1940-1990s*. Toronto: Canadian Scholars Press. Bakan, Abigail B and Daiva Stasiulis eds. 1997. *Not One of the Family: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in Canada*. Toronto: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②现代欧洲早期家务佣人在家庭生产中的出现,参见提勒/斯考特,1978。佣人占欧洲前工业社会城市人口的15-30%(p. 16-65)。

^③Kusnesof Elizabeth. 1989. "A History of Domestic Service in Spanish America, 1492-1980" In Chaney/Castro *Muchachas No More*, 17-36.

^④Kusnesof Elizabeth. 1989. "A History of Domestic Service in Spanish America, 1492-1980" In Chaney/Castro *Muchachas No More*, 17-36.

^⑤有关拉丁美洲家政服务的编史主要受玛戈·史密斯的研究影响。她的研究首次出现在其博士论文中,后发表为文章(1973)。她认为家政服务可以看作是农村妇女生活跟上现代化的机遇。随后的研究中家政服务也常带有妇女解放的意义,在拉丁美洲现在不总被当作是压迫妇女的行业了。(Pappas-Dehca 1999 Radcliffe 1999)。她认为妇女的职业介绍所更是这样。

重组使得人们不得不向外迁移,尤其是妇女离开乡村,土地所有权政策的改变使妇女逐渐丧失对土地的保有。这一点 Pappas- Deluca(1999)为智利指出过。拥有土地的机会十分有限,一直都被认为是妇女离开去城市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Radcliffe 1999)。^① 其他原因有男性就业率降低迫使妇女必须出去工作,农村的妇女工作岗位也越来越少,她们只有去城市寻找出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上述经济方面的因素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因素结合了起来,于是我们得到这样一些概念,除了父权统治下女性的传统角色外,还有现代化、解放和自我实现。智利的妇女一直利用移民到城市来消除对她们的限制与约束。她们被吸引到城市还因为她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在城里找到工作,例如像做家庭佣工。她们还相信自己有能力实现经济独立和社会生活的独立,能够远离乡村的无聊生活,能够在城里找到朋友交往。即使在一个文化保守的社会里她们的行动也被看作是一种解放 (Pappas- Deluca 1999)。^② 有时,家政服务的工作还使女性不必完全承担母亲的责任,甚至不再去承担母亲的责任,令她们超越仅仅做母亲这一单一的社会角色。据 Radcliffe介绍,厄瓜多尔也有许多妇女移民做家庭佣工,使自己成为“白人”^③,即更像一个白人,一个城里人。她指出在安第斯山区是否为白人不是看表象的,而是通过穿着规范、持有现金和操西班牙语体现的。(Radcliffe 1999 p. 92)^④

在南部非洲,移民到城市做家庭佣工还与农业经济结构性变化和土地所有制紧密相关。农村的男人要么去找工作而离开,要么为遗弃家人而离开(常常两个目的兼而有之),留下妇女独自抚养孩子。可是她们没有什么收入来源,既无工作经验又无教育背景,移民到城里做家庭佣工是唯一的选择。同时,农村经济结构性变化也促使乐意进城务工,而城里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正纷纷走出家庭工作赚钱,这样,城市对家庭佣工的需求就增长起来。

后殖民时代的南部非洲经济逐渐转好,虽然表现得还不很明显。想雇家庭佣工的人越来越多,情况各不相同。政府一直对这个行业视而不见,没有对工资水平做任何规定。佣工薪水的多寡和工作条件的好坏全由雇主随心所欲。^⑤ 工作条件怎样取决于雇主家庭属于哪一种类型。在男主人说了算的家庭里她们可能会遭遇性骚扰;在家里占统治地位的女主人对待她们可能像对“孩子一样”,或是对待伙伴那样。住在白人家庭的佣工工资会高一些;由于不能和主人同住一室,她们住在佣人房里,^⑥因此也有一定的隐私。在黑人家里工作,佣工常被当作“家里的一员”,当然这是为了在无形中更多地剥削她们的一种委婉的说法 (Miles, 1999)。^⑦

南部非洲的妇女去做家政服务有以下理论依据(目前有对南非、斯威士兰的调查;而在赞比亚殖民时代刚结束一段历史时期内家务佣人主要是男人):

——做家政服务佣工可以得到雇主提供的食宿,她们就可以省下吃住的费用。

——与住在农村的简易房和住在边远地区擅自占地的房子相比,住在雇主家里十分安全。

——她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这份工作收入让子女受教育,从而摆脱贫穷的恶性循环。

——对她们自身而言,这份工作是个跳板,一边做工一边等待更好的机会,或者等赚够钱买台缝纫机自己做点小生意。在加纳,家庭佣工变成街头小贩是很有可能性的 (Miles 1999 207)。^⑧

由于缺少专门的职业介绍所——这对家庭佣工来说可是太宝贵了,因为雇主经常克扣工资——她们找

^①Radcliffe, Sarah. 1999 "Race and Domestic Service Migration and Identity in Ecuador" In *Man, Gender, Migration and Domestic Service*, 83- 97.

^②Pappas- Deluca, Katina. 1999 "Transcending Gendered Boundaries Migration for Domestic Labour in Chile" In *Man, Gender, Migration and Domestic Service*, 98 - 113

^③“在基多,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拥有白人特征与城市的文明进步、发展壮大结合起来了,尤其是他们的社会精英,在表现基多城为首都和中心城市的文学创作和其他视觉形式创作时,特别突出这一点。” Radcliffe p. 91

^④Radcliffe, Sarah. 1999. "Race and Domestic Service Migration and Identity in Ecuador." In *Man, Gender, Migration and Domestic Service*, 83- 97.

^⑤这一点 80年代一直有争议说斯威士兰并非如此(参见 Miles p. 208)。在南非,现在对佣工的工资已有规定,不过规定未必得到了执行。

^⑥在雅加达,为西方家庭工作就得从根本上适应西方文化,而西方的生活方式在那里是被人瞧不起的。Einhirst Rebecca. 1999 "'Learn ing the Ways of the priyayi' Domestic Servants and the Mediation of Modernity in Jakarta, Indonesia" In *Man, Gender, Migration and Domestic Service* p. 242- 261

^⑦Miles, Miranda. 1999. Working in the City: The Case of Migrant Women in Swaziland's Domestic Service Sector. In *Man, Gender, Migration and Domestic Service*, 195 - 211.

^⑧Miles, Miranda. 1999 Working in the City: The Case of Migrant Women in Swaziland's Domestic Service Sector. In *Man, Gender, Migration and Domestic Service*, 195 - 211.

工作主要通过自己的关系网。“除非认识某个城里人,这人又认识的需要佣工的城里人,这些妇女是很难找到工作的。”(Miles 1999: 207)^①

她们解决问题的策略是靠朋友间的关系网。大家都知道做家庭佣工是为了养活子女让他们受教育,所以她们彼此帮助维持尊严。“为了孩子,这些家庭佣工找到了帮助自己解决问题的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未能确保斯威士兰这一行业可持续发展的不足。”(Miles 1999: 207)^②

做这行给她们带来了矛盾困扰。一方面她们对于外出做工不能照看孩子感到焦虑紧张;另一方面尽管男人遗弃了家,但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养家糊口,她们有感到独立的喜悦(LeRoux, 1999: 192)。^③在南部非洲,家政服务正处于十字路口,不同的感受冲击着女性佣工们,不同的道路等待她们去抉择:是逃离乡村抑郁的生活去城市拥抱前景与机遇,还是在压迫与贫穷中坚守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在英国这个最早出现佣人的国家,二战后家政服务行业中雇主的社会形象和工作的组织方式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前这一行是维多利亚时代、爱德华时代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到了20世纪50年代衰退了。到80年代做家政服务的女性人数再次上升,如今主要服务对象是中产阶级家庭,夫妻双方都工作且孩子很小的家庭。服务内容有两类最多:照顾孩子和打扫卫生。“80年代的一项研究表明,当代英国30—40%雇佣家庭佣工的双职工家庭让她们打扫卫生。而且,我们的调查显示双职工家庭中有一小部分(不到15%)雇不止一个佣工,(通常一个看孩子,一个料理家务)。因此这个行业成为当代佣工社会中产阶级日常社会再生产的重要一环((Gregson/Lowe 1994: 50)。^④这个行业在80年代急剧扩张,除了包吃住的和不包吃住的佣工之外还有很多机构也提供此类服务。

这对女性家庭佣工意味着什么?

“调查研究经常不能说明调查对象的个人看法,只有结合她们的观点我们才能观察到移民做家务劳动是怎样给妇女机会去挑战限制她们流动性的社会,怎样给妇女机会让她们继续前行。”(Pappas-DeLuca, 1999: 112)^⑤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一个关于移民的分析如此有赖于不同的研究者的角度。人们可以认为妇女移民是强加到她们头上的剥削和不平等制度下不得不流向四处,也可以看到她们的能动性,看到移民经历对她们的意义,看到她们是怎样与社会的束缚抗衡去寻求适合自己的机会。

结构功能主义研究方法强调以纺织业为代表的工农业的重组,认为主要是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少,农村家庭手工业经营日益萎缩的实际情况迫使农村妇女涌入家庭佣工的队伍中去。这种研究还列举出家庭佣工汇回家的那些款项的积极而有限的作用,人才流失对整个国家各方面的影响,^⑥以及消费型文化和实利主义之间的发展不平衡,^⑦从而强调指出以上这些对国家经济的重要影响。这种研究还关注于讨论妇女移民做家庭佣工是否可以看作现代化的推动力之一,或者她们本身就是封建制度的产物,而我们这个以平等为基础的民主文明的社会不该允许它存在。

可还有一个问题:移民去做家庭佣工有妇女解放作用吗?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与任何女性可以从事的行业相比,服务行业的环境主要由女性组成,当然少数例外,如英国管家,殖民时期的男仆,中国的男洗衣工。尽管如此,干家务活的是女性佣工,雇佣她们的是家庭的女主人。妇女完全有能力决定干这行,认为自己熟悉所作的工作(这与有些人提出的家务劳动不需要技能可不一样,实际上家务活也需要一定的劳动技能),通常也没有男人反对这种女性劳动和付给劳动报酬。除此之外,女性认为这个工作是现成的马上可以做的。

不同的外部和内部的因素促成并维持不同的移民体系。不同的动机和动力促使妇女从事这行。不同的

^①Miles Miranda 1999 Working in the City: The Case of Migrant Women in Swaziland's Domestic Service Sector. In Mansen Gender, Migration and Domestic Service, 195-211.

^②LeRoux, Tessa 1999 "Home is Where the Children Are: A Qualitative Study of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in Mmofla village, South Africa." In Mansen Gender, Migration and Domestic Service, 183-182

^③Gregson, Nicky and Michelle Lowe 1994. Servicing the Middle Classes: Class, Gender and Waged Domestic Labour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New York: Routledge

^④Pappas-DeLuca Katina 1999 "Transcending Gendered Boundaries: Migration for Domestic Labour in Chile." In Mansen Gender, Migration and Domestic Service, 98-113

^⑤这些移民的妇女几乎没有来自社会最底层的,而且都受过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教育。

^⑥这对移民原住地和移去的工作地文化的正负面影响可以通过表格归纳出来。参见 Licuanan, 1994: 112 (Licuanan, Patricia 1994. "The Socio-economic Impact of Domestic Workers Migration: Individual, Family, Community, Country." In Heyzer et al The Trade in Domestic Workers, 103-101)

移民体系中人口统计的结果也不同。一个国家内部的从乡村到城市短距离移民吸引了许多年轻的妇女甚至是孩子。在非洲和拉美这种事情非常普遍 (Sanyek 1990)。^① 城里的富裕亲属接纳农村来的穷亲戚,觉得这是一种责任;^②年轻的女人和孩子成为传统的学徒,给城里的亲属做学徒,或被他们收养。来自别国的家庭佣工常是年龄大一些的已婚妇女或单身母亲,她们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③ 南部非洲是个显著的例外,从农村移民到城里的主要是些有孩子的已婚妇女。

虽然所有通过移民来做家政服务的妇女都是为了找工作和赚钱,但她们未必都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很多还受过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教育,尤其是菲律宾 (Constable 1997: 77-79)^④和斯里兰卡的妇女,从城边地区移到市内的妇女也是如此。对于踏上移民务工之旅的妇女来说,具备表现为所受教育的社会、文化资源,懂得本移民体系如何发挥作用,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支付职业介绍所的费用,得到家人情感支持和物质支持,特别是替她们照看孩子,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不是需要移民的人就能移民,而是有钱移民的人才能移民。” (Ismail 1999: 232)^⑤

移民做家政服务的妇女各有不同的背景和原因。在拉丁美洲,家政服务行业体现了文化历史层面的阶级结构,体现了城市与边远地区的关系。这里的年轻女孩移民到城市找工作可以当作是个人成熟和自我解放的过程,因为这样她可以摆脱男性统治和家长的控制。行业的文化传统保护她们不受粗野的污辱,使她们把这个工作看作为通往城市生活和白人身份的有效途径。在这个传统中,雇主与佣工关系稳定,阶级界限清楚,佣工有可能向雇主争取一定的自由和不至于太繁重的劳动量;在城市里,她们与同行有一定的社交,共同反抗别人的蔑视,就好像反抗把她与社会隔绝开的家庭一样。这个工作让她们远离污辱,提供她们机会合作。20世纪60—70年代联合式的家庭佣工组织帮助改善了工资与工作环境。天主教会为她们提供合法的聚会场所,尽管教会的宣扬倾向于雇主,但这毕竟为有需要的佣工提供了住所与帮助。

移民的第二种情况与养家糊口和维持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有关。有些移民体系比较完善,例如从菲律宾向香港和北美的,从斯里兰卡和印尼向中东地区的,菲律宾、斯里兰卡和印尼的妇女坚信出国务工可以赚到更多的钱。有的菲律宾人舍弃像职员、教师这样需要熟练技术但薪水低的工作去香港、加拿大找类似家庭佣工的工作,因为这样她们能赚到足够的钱给家里添置消费品,给家里盖房子,让子女受高等教育。穆斯林妇女移民到中东工作也是为了这些目的。为了不让家庭陷入困顿,^⑥她们走上了中东务工之路;同时自己可以摆脱伊斯兰社会束缚她们的传统。

国家间移民的主要动机是想要达到或维持家庭的温饱生活,甚至小康水平。而在南部非洲,城边地区向市内的短距离移民则是出于生存的需要。不过,在这里,为了后代能受更好的教育仍然是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 (Miles 1999)。^⑦ 但是无论出于哪种原因移民,这些妇女由于担负着全家的重担,必然感觉到受制于人。她们主动寻找机会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甚至有时是迫于家庭压力这么做的时候,依然清楚地意识到家庭的生活状态就取决于她们。她们的收入决定着家庭的未来和孩子的未来。这样的认识使妇女充满了力量,可以帮助她们在遇到困难离开工作地时重新鼓起勇气回去继续工作,^⑧虽然那里常常压抑她们剥削她们辱骂她们。

作为资源的外来身份

在家政服务这个领域里最实在的社会文化资源就是佣工的外来性或者佣工与雇主的文化相异性。她们

①Sanyek, Roger and Shelley Colen, eds. 1990. *At Work in Homes: Household Workers in World Perspective*.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Monograph Series, Nr. 3.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②对爪哇的社会精英人士来说,雇佣仆人与庇护提携穷亲属这两件事是密切相关的。这种普遍行为方式再加上责任感把上流社会的精英和乡下穷亲戚联系起来……雇佣人就不只是雇佣人那么单纯……乡下的穷人毫无道理地认为,在城里做仆人代表一种特权,有机会学习上等人的生活方式,找到社会上向上爬的路径,虽然实际上这几乎很难实现。Ehnhist 1999: p. 246

③如同当地负责安排工作的职业介绍所规定的那样,移民到中东的妇女年龄最小为30岁。

④Constable, Nicole. 1997. *Maids to Order in Hong Kong: Stories of Filipino Worke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⑤Ismail, Munira. 1999. "Maids in Space: Gendered Domestic Labour from Sri Lanka to the Middle East." In Manzen, *Gender, Migration and Domestic Service*, 229-241.

⑥这通常是男人和女人都越来越难以找到工作造成的(例如世界贸易解放的范例造成的地方纺织业解体)。

⑦Miles, Miranda. 1999. Working in the City: The Case of Migrant Women in Swaziland's Domestic Service Sector. In Manzen, *Gender, Migration and Domestic Service*, 195-211.

⑧斯里兰卡的穆斯林妇女常这样在本国和中东地区之间往返三四次。

的外来性是造成她们被严重剥削的主要原因,这样来看以上说法似乎有些奇怪。最明显的例子是看小孩的保姆和为换取食宿和学习而为某家做家务的年轻外来移民。这些女性被雇佣完全是由于她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那些为了学习而来的年轻人想要学习当地语言,体验当地生活方式,而雇主则需要训练有素的保姆(不论是英国的还是外国的)或者具备语言技能的年轻外来移民,两厢不谋而合,各取所需。这体现了这个行业的核心本质。外来佣工与当地人的文化相依性,这一点并没有像其可能并应该的那样被视为干这行的优势,但是外来身份正是她们受雇的首要原因。外籍的女性佣工勤劳,乐于受雇,而本地妇女不愿做这种工作,至少是不愿以雇主所出的价格受雇。外籍佣工的文化差异性一方面增加了被严重剥削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掩盖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社会等级制度,因为它发生在雇主所处的阶级社会现实之外。外籍佣工需要赚钱,需要找到住处(安全和保护),需要得到帮助来适应新文化,雇主需要能住在家里随时提供服务的廉价劳动力,所以双方正好各取所需。^①

同理,家庭佣工也把自己置于与本族等级权力制度相似的文化之外,因为置身于那样的文化自己不可避免地又要处于最底层。这样做的时候她会参考自己在本国的社会地位和在家中重要性。她还可能强烈地意识到本族文化中好的饮食习惯和养育幼儿的习惯方式(Hondagneu-Sotelo 2001)。^②

外来佣工去工作的那些地区(北美洲、欧洲、中东)在种族、阶级和性别方面的制度和文化很容易使人在认识当地的历史与现状时形成一些模式化的印象。妇女的角色常与家务活相联系,所以她们常与那些过时的理念、文化标记性质的东西结合起来。虽然英国妇女总以“保姆”的形象出现,^③但是实际上斯堪的那维亚地区和德国的妇女被认为讲究卫生、诚实可信而且富于这方面的能力;与此相对,人们觉得爱尔兰女性不爱清洁又信奉天主教;芬兰女人则被看得爱好清洁但不守规矩。^④这就是北美洲人想到这些女性时头脑中参考的框框。这些模式化的印象在现今人们雇佣家政服务时依然影响着大家的选择。在人们的印象里加勒比海地区的妇女又懒又傲;牙买加的妇女特别难以管束,但她们懂英语有语言优势;菲律宾人既能干又友善,是好管家;拉美的女性有种天生的本领,能亲近孩子照顾孩子。职业介绍所利用人们的这些模式化的印象来面向客户,通过提供专门的资料更好地为客户找寻合适地家庭佣工(Stiehl/England 1999)。^⑤另一方面,求职的妇女也利用这种心理来提高自己在劳动力市场的价值。

雇主在文化宗教上的倾向给移民到中东的穆斯林妇女带来许多优势。从斯里兰卡移民到马来西亚的妇女可以多方面地运用自己的穆斯林文化资本。她们更容易保住工作,可以从地方招募处得到交通补贴,只需交些象征性的招募费。一旦被雇她们还可以通过遵守宗教习俗来博得雇主的好感,稳定或提高自己在家中的地位。“这些女佣利用本人的外国穆斯林身份,如果这个身份适合她们的话,更容易在心理上和实际生活中灵活地融入新社会”(Ismail 1999: 232)。^⑥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因此把移民做家务服务看作一种机制,既能解决家庭的经济困难又能突破个人的自我局限和种种约束?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社会文化领域里妇女的角色和家政服务在妇女这一角色的传统中所处的位置,不仅如此,还取决于研究者和作者的角度和观点。如果认为这样的移民是保证家庭成员生存和提高家庭生活水平的必需手段,那么妇女必将感到自己更加有力量。远离男权和父权的直接统治,自己管理钱财,自主地支配积蓄,这些都会提高妇女的自尊心。能在公共场所有自己的社交,不再陷入孤立无援,不再是家庭里看不见的人,这些都帮助妇女不再因为自己来自外国、只是个家庭佣工而感到耻辱感到受贬斥。对组织帮助她们提高工资改善条件的人来说,他们的努力也得到了支援,因为女性佣工最不满的情况之一就是劳动得不到认同、感谢和尊重。所以,任何事只要能帮助她们得到认同,使她们被认为是技术工人和重要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都令这样的移民带有妇女解放的意味。

①有些富有同情心的女主人会帮助家庭佣工与政府部门协调和学习当地语言。

②Hondagneu-Sotelo, Pierrette 2001 *Doméstica: Immigrant Workers Cleaning and Caring in the Shadow of Afflu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③参见电视节目“超级保姆”,该节目中常有一位朴实的妇女,操英国口音,带英式的雨伞,开古怪的英式汽车,照看一些不听话的孩子。(Mary Poppins)

④所有这些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出现过,例如,参见 Mary McCullough的 *Painted Fires* 女主人公是一位从芬兰移民来做家政服务的妇女。

⑤Stiehl, Bernadette and Kin England 1999 “Jamaican Domestic, Filipina Housekeepers and English Nannies: Representations of Toronto's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In M. Jensen, *Gender, Migration and Domestic Service* 43-61.

⑥Ismail, Munira 1999 “Maid in Space: Gendered Domestic Labour from Sri Lanka to the Middle East” In M. Jensen, *Gender, Migration and Domestic Service*, 229-241.

为了仔细体会这种进步,我们必须看看这些妇女回到本国后在促进本国文化发展上起了多大的作用。这种文化的改变可能很细微但也很有效,因为它发生在家庭这一最直接的层面上,将会协调家庭内部的权力,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些妇女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选择,这样她们遭到剥削时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动性。通常,移民做家政服务只在这些妇女寻求不同的生活目标和人生道路时所处的一种状态,但是,这也是一个现成的帮助她们实现目标的手段,还是一种一个妇女可以自己掌控的方法。

结语

家庭佣工的这些经历表明,对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的划分过于简单化了,这样去理解当今世界的国际政治远远不够。表面上看有数以十万计的第三世界国家妇女在为其他更富裕的第三世界国家妇女打扫卫生、照料孩子。现在,中国政府和妇联发出官方号召,鼓励城市家庭雇佣家庭佣工,从而分担这些家庭主妇的家务劳动。在美国和英国,家庭佣工被看作是职业女性的得力助手,帮她们分担了肩上事业和家庭这两副重担。在拉丁美洲,家庭佣工是妇女从业人数最多的工作。大部分女性家庭佣工在为其他女性工作。那些在波斯湾地区做家庭佣工的大部分妇女和在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工作的菲律宾妇女都被我们仍然认为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作者(Enloe, 1989: 193)。① 以上是辛西亚(Cynthia)对家庭佣工移民的全球影响所作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她们的经历,她们所处的移民体系,她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参与,她们的生活轨迹和这一行的术语行话对许多假设都提出了疑问,也指明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单身男性不能全面地反映移民的共性。这个过程和经历中不止有男性,两性都广泛地参与其中,对移民的分析也应从这样的角度进行。通过移民做家政服务是单身女性可利用的机会,她们也充分利用了这样的机会,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尽管,这样的移民体系形成源于经济因素和物质刺激,但是这些妇女也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力量,维持这个体系,适当改变这个体系,使之为自己所用。她们的充分参与给现有的移民体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改变了移民的去向,使移民潮有所扩大、增长或减弱。她们的各种活动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环境也有一定影响。她们的个人行为使世界变得更小,她们移民去别的国家,带去了本国的文化;她们在外国给家乡汇款、寄包裹,又把世界文化捎回了家,把家人在电视看到的世界更真切地带到他们面前。从一国移民去别国做家庭佣工仿佛是一桩交易,这些移民务工的女性将会给交易双方的人民生活带来比我们能认识到的更大的影响。②

(责任编辑:蒋海升)

① Enloe, Cynthia. 1989. *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② 其他参考文献: Barbič, Ana and Inga M. Klavžič. 1999. "Domestic work abroad: a necessity and an opportunity for rural women from the Goriška borderland region of Slovenia." In M. M. Jensen, *Gender, Migration and Domestic Service*, 164-177.

Chaney, Elsa M., and Mary Garcia Castro, eds. 1989. *Muchachas No More: Household Worker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Hansen, Karen Tranberg. 1989. *Distant Companions: Servants and Employers in Zambia, 1900-1985*.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azig, Christiane, ed. 1997. *Peasant Migrants - City Women. From the European Country Side to Urban Americ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enkes, Barbara. 1989. *Heimat in Holland. Deutsche Dienstmädchen 1920-1950*. Straelen/Niederlande in Straelener Manuskripte.

Hoerder, Dirk and Leslie Page Moch, eds. 1996. *European Migrants: Glob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Knothe, Maria Anna. 1997. "Land and Loyalties: Contours of Polish Women's Lives." In Hazig, *Peasant Migrants*, 143-182.

Knothe, Maria Anna. 1997a. "Recent Arrivals: Polish Immigrant Women's Response to the City." In Hazig, *Peasant Migrants*, 238-299.

Peny, Adele. 2001. *On the Edge of Empire: Gender, Race and the Making of British Columbia, 1849-1871*.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Sanjek, Roger. 1990. "Maid Servants and Market Women's Apprentices in Adabraka." In Sanjek, *Coler, At Work in Homes*, 35-62.

Smith, Margo L. 1973. "Domestic Service as a Channel of Upward Mobility for the Lower-Class Woman: the Lima Case." In Ann Pescatelli, ed. *Female and male in Latin America: Essays*.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2-207.